

考古研究

李民

河南人民出版社

L.47

書法与古史研究

李民

河南美術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九篇论文，这些论文主要是研究《尚书》有关篇章的内容、制作时代及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价值。书中的序言由刘起钊先生撰写，序言中全面地介绍了《尚书》的源流；书中还收入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关于夏史与太学》的一封信。

书名题字：顾颉刚

责任编辑：庄 昭

《尚书》与古史研究

李 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100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 11219·2 定价0.40元

目 录

- 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刘起钎 (1)
- 一 《尧典》与氏族社会 …………… (25)
- 二 《禹贡》与夏史 …………… (45)
- 三 《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 …………… (65)
- 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
- 四 《甘誓》“三正”考辨 …………… (75)
- 五 释《尚书》“周人尊夏”说 …………… (84)
- 六 顾颉刚先生关于“夏史与明堂”的一封信 …… (99)
- 七 “汤始居亳”与“仲丁迁隰”考 …………… (101)
- 读《汤誓》、《书序》札记
- 八 《盘庚》的制作时代 …………… (120)
- 九 《盘庚》所反映的商代贵族与平民的斗争 …… (135)
- 十 《商书》所见商代农业之一斑 …………… (149)
- 兼述商代的农业生产及其劳动者和社会发展
阶段
- 后记 …………… (158)

序 言

李民同志致力于《尚书》与古史的研究，用力很勤，时有所获。这里是他近年的几篇研究成果，汇集问世，必能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讨的开展，起很好的作用。

李民同志为研究自夏代开始的我国上古历史，除注意运用考古发现的材料外，也注意到《尚书》材料的运用，这是由于《尚书》对我国古史研究非常重要的缘故。现在我特简要地系统地介绍一下《尚书》，以便我们知道为什么研究中国古史，必须研究《尚书》，从而认识到李民同志这部文集在学术上的造诣。

(一)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它保存的基本是奴隶社会的文献，其中包括周代真文献和半真文献，商代半真文献和在流传中受了周代文字影响的真文献，以及周代根据一些往古素材加工编造的虞夏假文献（其中有少量半真的，如《甘誓》）。这些都是我们科学地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史料。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

典，在儒家“五经”中地位最尊，既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也少不了它。

由历史记载，可以确知我国古代的统治者都设有各种史官，负责记录他们的言行事迹。甲骨文中担任贞卜的官员事实上就是随时记录殷王活动的史官，而甲骨文和金文中还有好几种不同名称的史官。《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虽把左、右史的职掌说得不同，但总是反映了古代跟在统治者身边的史官随时记录着统治者的“言”和“事”。《艺文志》说：“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说明“君举必书”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供统治者注意。因此把统治者的“言”记下来，按篇保存，就积累成讲话记录或文告的汇编；把统治者的“事”记下来，按月、日排列，就积累成编年大事记。这两种都叫做“书”。《荀子·劝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较晚的吴澄又完整地在《书纂言》中解释说：“‘书’者，史之所纪录也，从聿、从者。‘聿’，古笔字。以笔画成文字，载之简策，曰‘书’”。都说明“书”是史官的记载的通称。

到春秋战国时，史职发展，史官记载的方面广了，出现了不同体裁的不同名称，计有：“语”（如《国语》），“志”（如《周志》），“世”（如《世本》），“谍”（如《谍记》），等等。而编年大事记，各国则各有不同名称，

如鲁叫《春秋》，晋叫《乘》，秦叫《记》，楚叫《梲杌》等，《墨子》把它们综称为“百国《春秋》”。至于讲话纪录或文告的汇编，便逐渐专用“书”这一名称，并按王朝加以汇编，分别称为《夏书》、《商书》、《周书》。（这时并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十八》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还没有“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

这时的《书》和当时流行的《诗》，成为士大夫必读的两种典型读物。虽然儒家的课程是“诗、书、礼、乐”四种，但“礼、乐”只是他们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读本就只有《诗》、《书》两种。到孟子、荀子时的儒家课程，加上《春秋》，成为五种。到《礼记·经解》所说的，又加了《易》，成为六种，《庄子·天下》列举了这六种为邹鲁之儒所习，其《天运》篇称为《六经》，《史记·伯夷列传》称为“六艺”（《周礼·地官·保氏》之“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由于古时“乐”的谱子无法写成本本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称为“五经”。到这时，《书》作为《书经》，才开始称为《尚书》。刘歆说是欧阳氏今文家首先这样称呼它的。王充《论衡·正说篇》解释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刘熙《释名》说：“《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伪《孔传》则说是“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可

知“尚书”一词的意义就是“上古的史书”。

至于《尚书》一书的内容，则包括称为诰、谟、誓、命、典等的统治阶级文献。“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谟”是臣对君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典”载重要史事的经过或某项专题史实。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以事标题的，如《高宗彤日》、《西伯戡黎》；以内容标题的，如《洪范》、《无逸》等。这些基本都是当时统治者的讲话纪录或文告。（其中有叙事较多的，如《尧典》，有不是讲话纪录的，如《禹贡》，与全书体例不一致，正反映这些篇晚于其它诸篇，是后来文件。）现在除了考古发现得到一些原始的但却又都是片断的孤立的文献外，只有《尚书》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把古代奴隶社会文献系统编辑起来的史书。

（二）

这部史书，经过了多灾多难的复杂曲折的历程。按理，当时统治者有过多少重要讲话和多少政治活动，就应当有多少篇讲话纪录和多少篇编年纪事。从《尚书》里看到，当商王朝灭亡后，商遗民心不服周，周公就对他们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多士》）。“典”是放在架子上的竹简，“册”是用绳子编着的竹简，是说殷朝的上代传下来的竹简里，记载着商汤革掉夏命的历史事件，说明周革殷命是有你们祖先的先例可援的，殷人也就用

不着怨恨周人。这就可知商代史官的记载在周初还能看到。《墨子·贵义篇》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大概近于事实，这说明周公所以熟悉商代的史事，是由于他掌握了不少商代史官记载的“书”的原故。但竹简的最大缺点是容易腐烂，经过二百年之后就没法再传下去，这只需一看《春秋》就知道。《春秋》本是鲁国史记，当然应从伯禽封鲁时开始，可是现在看到的《春秋》却从一个进到春秋时代已四十多年才在位的鲁隐公开始，就是由于鲁隐公以前的竹简在鲁哀公后整理时已断烂毁灭了；而且鲁隐公以后的竹简也多断烂残损，所以才有《桓十四年》“夏五”、《庄廿四年》“郭公”等残缺文句。还有就是时隔几百年，不同地区所用方言纪录下来的文献，对于异时异地的人来说无异是死文字，人家也就很难去利用它，例如周初诸诰用的是岐周方言，对战国时以东方语言为基础形成的“普通话”来说，它已是难懂的死文字，到汉代更难懂，司马迁只把能懂的战国时写成或修改的译载在《史记》里，“殷盘周诰”等真史料明明重要，也只一举带过。可知古代难懂的史料，容易被抛荒在一边。再加上统治者的有意摧残，例如《孟子·万章下》所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史记·六国表》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所以古代的史书很难传下来，所谓“百不存一”，说明传下来的比例是很小的。

当先秦战国之世，百家争鸣，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的时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学说，尽量用往古的历史来做论证，

因而到处搜集古代文献资料，结果通过他们的努力，还是找到不少篇的《书》。当时引《书》次数最多的是《左传》，直接引《书》四十二次，包括可能属于《书》的，可共达五六十次；而引用篇数最多的是《墨子》，共达二十多篇。其余儒、墨、杂百家及一些史书都纷纷引《书》。它们在泛称“《书》曰”以外所具体举到的篇名，合计共有四十余篇，其中有三十来篇的篇名在后世所传的《尚书》中是查不到的，如《夏书》中的《夏训》、《禹之总德》、《禹誓》、《禹刑》、《武观》（伪书作《五子之歌》）等；《商书》中的《汤征》、《汤说》、《汤刑》、《汤之官刑》、《尹吉》（伪书作《咸有一德》）等；《周书》中的《武王将事泰山隧》、《去发》（太子发）、《伯禽》、《唐诰》、《禽艾》、《相年》（《距年》、《竖年》）、《术令》、《九刑》等。还有后世所未见的《楚书》、《郑书》等。只有《荀子》所引篇未超过今之《尚书》。当然先秦诸子所没有引到的书还是不少的，即在伏生所传残存的秦博士本二十八篇中，先秦诸子未引的就有十四篇之多。这样，先秦诸子引的，而今天《尚书》中无有，先秦诸子未引的，而在今天《尚书》中又出现，如此里外相差就更多了，可见《尚书》于先秦时代还有不少篇，所以能为先秦诸子所纷纷称引。

但先秦诸子所引用书篇，彼此分歧也很大，例如儒家的本子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甘誓》，两篇中心内容也完全相同，但文句却有很大的出入。又即是墨子一家所引同一篇书，也互有分歧，例如《非命》上、中、下

三篇都引《仲虺之诰》，文字却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太誓》，文句也有很大的歧异。根据俞樾说因为墨子学派分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所以《墨子》每篇皆分上、中、下。那么这就是三家所传的本子的不同，当然与儒家《孟子》及《左传》所引的《太誓》更有出入了。这是由于各家彼此按着竹简传抄，既容易有错简、脱简，传抄中又易有错字、脱字、增字及误写等等，于是就自然造成很多分歧。

各家引用书篇都是为宣扬自己的学说服务，这是造成分歧的更主要原因。有些文献和自己的学说不一致，或者没有符合自己学说的古史文献时，他们就干脆自己编造古史，这就是所谓“托古改制”。当时主要的儒、墨两家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都纷纷塑造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先王尧、舜、禹，因此《韩非子·显学篇》揭露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指出了他们编造古史的本象。我们看到的儒家所塑造的尧、舜、禹，就在他们所编造为《虞夏书》（原只称《夏书》）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中。他们编造这些时，尽量利用了不少远古素材，例如《尧典》中就有不少远古天文资料，象鸟、火、虚、昴四中星，确是我国古代祖先据以定时令所观察的标准星象，近世东西方天文学家据《尚书》的注疏材料并依天文数据有推定为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甚至还有推算得更早的，竺可桢已指出其疏误，以为用岁差推算，其中只有昴星的位置是在唐虞以前，

其余三星都不早于商代。总之，我们今天至迟在甲骨文中看到了几颗中星。其他还有远古各种神话和传说资料，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活动的遗迹资料，等等。确知儒家编造这几篇时尽量利用了古史遗存。他们编造的手法，是在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古代不同时期和不同氏族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时存在的君臣和兄弟，又都是理想的圣人，做出了很多的美政，使人们读了之后，只觉得美好的尧舜盛世早存在于远古，大家应一心向往那个黄金时代。至于《禹贡》，原是战国之世走向统一前夕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把当时七国所达到的疆域算做天下，而根据自然地理来划分区域，各州都把特产作贡物，并据土地肥瘠来定各州田赋的等次。这是对当时实际的地理作出的一个理想式的规划，原是两千多年前一篇可贵的地理学杰作。但儒家把它作为大禹时代的作品，把禹加工美化为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于是他们便把这几篇编造的《夏书》和原有的《商书》、《周书》配套成龙，作为记载“三代圣王”体系的儒家这一部重要经典就告成了。

从此这部原来的历史文献，便成为“二帝（尧舜）三王（禹、汤、文武）”以及周公、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煌煌宝典，儒家所倡导的“道统”，就靠了它很坚实地树立起来，构成统治中国人民几千年的中心思想。

(三)

西汉所流传的《尚书》，是秦博士伏生传下来的，后来称为《今文尚书》。当秦末战乱时，伏生把《尚书》竹简藏在墙壁里，到乱定并废除了秦《挟书律》后，便把竹简从墙壁里拿出来，可是已经断烂毁失了不少，勉强拼凑只存得二十八篇，就用来在他的家乡齐鲁之间教授门徒。有一种传说是伏生已九十多岁，汉文帝派晁错到他家传习，由他口授给晁错。更有一说是由他女儿转述，然后由晁错记录下来转送到宫廷里。这一传说富于传奇性。事实上传授《尚书》的，是伏生门徒中后来发展起来的三家，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在汉武帝到汉宣帝时先后都立于学官（等于现在的大学，但设在王朝内），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汉武帝时民间所献的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则把《盘庚》分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原来当是用秦朝通行的小篆写的，在汉代传授门徒时当然改用了当时通行的隶书，等到“古文”出现以后，便被称为“今文”，意为汉代现今用的字体。这三家也就被称为“今文三家”。

汉代今文学家与谶纬神学相结合，编造一些神话，说二十八篇是代表二十八宿，《太誓》是北斗等，这时就出现了《纬书》。《尚书璇玑铃》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

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十八篇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说《尚书》是孔子删定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以上材料便可以看出西汉今文学的特点，一是把经文与讖纬神学结合起来，使经文神学化，使“经学”成为汉代神学“阴阳五行说”的“侍婢”。他们编造了一部《洪范五行传》，牵强附会地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用“五行”去解释，《汉书》把它编为“五行志”，以致全部二十六史中，十六部史都有《五行志》（《魏书》叫《灵征志》、《清史稿》叫《灾异志》），这都是西汉今文学家造成的。二是空虚烦琐，他们实际对艰涩的《尚书》文字不能懂，但因拿了学官厚禄，不得不强不知以为知地主观臆说，只好用离题万里的方式来掩盖其无知，就搞了许多章句和传注，例如小夏侯学派的秦恭解释“尧典”二字写了十万余言，解释“曰若稽古”四字，写了三万言。今天见到的《尚书大传》、《韩诗外传》也都是与经文无关，随意胡扯的传训，由此可见今文学家解经的特色。三是严于家法和师法，立过学官的就成为一家，各个学派一定得遵守自己这一家的家法和师法，门户之见极深。表面上“师说”装得冠冕堂皇，实际内容却很贫乏、牵强、愚妄、悠谬。只是因为如《汉书·儒林传·赞》所说的“盖禄利之路然也”的原故，各学派的人就都得死守着不敢有所背离。

到汉末，为了统一今文学各家经文文字的纷歧，在熹平年间刻了石经立于太学，后来就称为《熹平石经》。刻“五经”及《公羊》、《论语》七种。其中《尚书》用的是欧阳

氏今文，而把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在“校记”里。现在我们看到汉《熹平石经》残石的拓片，从实物再次证明汉今文及《尚书》今文三家的文字情况，能供我们校勘《尚书》文字及考订史实之用。例如现存《无逸》中叙商代三个贤王是中宗、高宗、祖甲，但依《汉石经》则是太宗、中宗、高宗，和刘歆《议宗庙礼》所引符合，足订今本《无逸》之误。此石经原残存八千余字，其中《尚书》八百多字。近年又发现残石三段，其中《尚书》可识者一百七十余字。合计将近千字，分属二十三篇。

(四)

汉代又有《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就是先秦六国所用篆籀等字体。汉代离六国时还不远，这种新发现本是很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出现古文《尚书》本，先后传闻出现过好几次。其后古文盛行于东汉，传衍至魏。

第一部《古文尚书》本，见《史记·儒林传》中记载的：“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这部就是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古文尚书》本。

第二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所谓“中古文”，就是皇帝“中秘”所藏《古文尚书》本，是否即是孔安国家传本，不见确

切记载。龚自珍在《说中古文》中提出怀疑，如果是皇家本为什么不立学官，又不拿出，恐怕此本不大可靠。

第三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儒林传》所载：

“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百两篇”即所造经文百篇，加上另外的两篇，即把所编造的百篇《书序》（就是每篇有一讲明此篇写作原因的简短叙述语）分成的上下两篇。张霸的百篇伪书虽被废黜了，但所造“百篇《书序》”却留下盛行起来，并宣称是孔子写的。这就成了《尚书》学上影响最大的事，使张霸的创作变成了真历史。其实《史记·孔子世家》只说：

“孔子……序书、传。”“序”本是排列之意，但张霸却利用它伪造为孔子作了“书序”，从此历代奉为经典，直到宋朝才有人怀疑这问题，现在基本弄清楚它的实际，百篇《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出于张霸“百两篇”。

第四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楚元王传》所载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说：“鲁恭（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因此刘歆请求把这部《尚书》和《左氏春秋》、《毛诗》、《逸礼》一并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坚决反对，于是刘歆就写了这封责备博士们的信，从此引起了今古文之争，贯穿于中国学术界近两千年。这个本子后来或称为“鲁恭王本”，或称为“孔子壁中本”、“孔壁本”。《汉书·艺文志》在叙述此

书后，接叙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一事，没有说明所谓“中古文”（即上述第二部古文）是否即此孔壁本。这个本子后来并无着落，但是所提出的所谓“逸书”十六篇篇名却传了下来，《尚书·尧典正义》引载这十六篇名是：《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益稷正义》引作《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

第五部《古文尚书》本，见《汉书·十三王传》所载：“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这部《尚书》一般称“河间献王本”。但在《史记·五宗世家》里只说河间献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一句也没有说他访得先秦旧书并得到《尚书》，看来很可能是东汉初年的古文学家利用他“好儒学”的传说附益成这件事的。

所有以上这几个本子，都只有古文经，而没有“古文家说”的传注。

第六部《古文尚书》本，见《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这就是杜林漆书古文本。他的本子叫古文，可是没有古文《逸书》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篇名的二十九篇。可由杜林原本称一卷推知必非《尚书》全书，而只是书的一部分。他是根据了这一部分漆书的方式，推广到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即今文二十九篇的各篇，才凑成杜林本古文二十九篇的。他传了几个门